

上接《E1

台湾青年 抗战悲歌

林信子：我大哥林如培一九二四年出生于板桥的士绅家庭。父亲历任日据时期的板桥信用合作社理事、台北州州议员等职。母亲出身北投望族。大哥在主要是日本人子弟就读的海山小学校毕业后考进台北二中。二毕业后，大哥遵照父命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却因考试期间罹患流行性感冒而落榜，因而进入早稻田大学预科补习。第二年，他考取以培养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干部为任务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第四十四期经济科，随即于四月底奔赴上海，寻找参加抗战的道路。

李苍炯：一九四二年三月，苍降大哥台北二中毕业。为了到大陆寻找参加抗战的路，他报考了伪满洲建国大学，但是因为肺不太好，体检未能通过，落榜了。因为这样，他就暂时在芦洲公学校充当老师，准备有机会再到大陆去。

李薰山：我和李苍降认识于一九四三年吧。那时候，他是公学校的老师。我是台北帝国大学豫科（今芝山岩国安局旧址）的学生。我在竹中时，尽管对日本学生欺侮台湾学生的现象感到不满，但思想还谈不上什么进步性。一九四一年考进台北帝大豫科后，基于民族情感，我开始关心祖国大陆的事情，并且主动到川端町（今枯岭街一带）的旧书店，买了很多社会科学的书来看，也偷偷地读过孙文的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书籍。但是，在殖民当局的严厉统治下，我从来不敢向同住的寮友透露自己的思想倾向。后来，台北帝大豫科来了一名汪精卫伪政府派来的交流学生；他和其他十几个来台北各校交流的学生（包括就读台北医专的康有为大哥的两名孙女），住在水水路、迪化街一带的兴亚寮。

为了多多了解祖国大陆，我常到兴亚寮找他们聊天。因为这样，我先后认识了基于同样目的而常到那里走动的雷灿南与李苍降。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常常利用假日到淡水玩。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爬观音山，上了山顶，立刻在树上挂起雷灿南带去的一面中华民国国旗。一九四三年十月，我通过考试，成为台北帝大工学部应用化学科第一届十二名学生之一。有一天，我在帝大图书馆偷了两本重庆版的白话本抗日禁书，其中一本的书名是《清算日本》。我读完《清算日本》，就拿给雷灿南看。雷灿南读完，又再拿给李苍降看。但是，李苍降不小心而被担

任日本密探的同事检举。因此，在那被大逮捕中，李苍降和雷灿南也先后被捕。

陈炳基：一九四三年年底，同样具有反日思想的五年级学长唐志堂主动找我，接着又给我介绍了台北工业学校毕业的刘英昌，我也给他们介绍了二中同学郭宗清和黄雨生。之后，唐志堂和刘英昌又给我们三人介绍了留日归来不久的女外科医生谢娥；她说她学外科的目的，是准备到祖国大陆为受伤的抗日战士治疗。一九四四年年初，唐志堂告诉我们，谢娥听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美、英、中三国的《开罗宣言》决定：日本战败后，台湾、澎湖列岛及东北要归还给中国。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乐观地认定，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一定能够打败德、日、意轴心国，我们也应该投入祖国的抗战行列，打败日本。

二月下旬，我们五人就约在汐止山上的观音寺密商行动计划，最后依照谢娥的意见决定：因为唐志堂和刘英昌即将被征召入伍，应该先行偷渡大陆；我们三人则待毕业后看情势而定。三月，唐志堂和刘英昌动身的前夕，我和郭宗清及黄雨生一起到八堵刘英昌的住处，饮酒高歌，欢送他们两人。四月，唐志堂、刘英昌和谢娥却相继被捕了。然而，我和郭宗清及黄雨生并不知道。大概是四月中旬，郭宗清在上课时被日本宪兵诱捕。五月上旬，我和黄雨生也在学校被日本宪兵逮捕。他们先把我们带回各自家里搜查，然后把把我们关押在西门町的台北宪兵队本部。拘留所里，人满为患。



1937年，即全国抗战爆发前后，本文追述的主人公李苍降考进台北二中，并在校内积极组织 and 参加反日活动。

“心系社稷，不忍坐视”

“虽置身日本高压之下，心系社稷，不忍坐视祖国之危急。乃舍身家于不顾，潜心革命，计划组织台湾青年，集结青年力量，呼应祖国之抗战。”

刘英昌：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还是二十几日的晚上，突然有三个宪兵到八堵我家，什么也没问，就把我直接押送到台北宪兵队。我那个押房一共关了八个人，屎尿都得在里头处理，又挤又不卫生。八个人当中有算命的，也有走私黄金的，其中同时被捕的只有一个台北帝大医学部学生蔡志恕。他告诉我，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常与同学郭琇琮到汪精卫伪政权“驻台北领事馆”走动。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次被捕的不仅仅是谢娥和我们几个人而已，台北地区的学生牵连甚广。

许训亨：为了避免被市役所动员课征召当日本兵或军属，台北二中毕业后，我通过介绍，到台北市役所会计课当课员。休假时，我和苍降还是常在一起。有一次，我父亲做生日，按照佛教拜道求平安添福寿，他也跟着拜，仿若我家兄弟一般。有一天，苍降的大姊无缘无故来找我，说苍降被日本宪兵抓去了，要我赶紧把他往来的信件收起来。我虽然常跟他一起玩，但没有谈论思想的问题，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抓。尽管我没有他写给我的信，小心起见，我还是找了一遍，然后把其他在日本的朋友有骂日本的信都收拾好。

后来，我要去上班时，一个戴打鸟帽的人，骑着脚踏车，从后头追上来，叫住我，问说你是不是许训亨，有人找你。我心想，这个人，我不认



1945年9月，台湾省旅汉同乡会组织队伍，高举大幅标语，欢迎进入汉口的中国军队。

识，哪有人叫不认识的人来找我的道理。他大概知道我的怀疑，随即表明身份，并说是宪兵补大佐（台湾人）约我谈话。我只好跟着他，走到西门町的宪兵队（今远东百货），在后面剑道场旁的一个房间等待。当时是早上八点半左右。等了半个钟头后，一个三十几岁的宪兵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我注意到，他手上拿的卷宗里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关于李苍降的资料”。当下，我就知道，今天被叫来，一定是要问我有关李苍降的事情。

果然，他拿了一张纸给我，叫我把所有的朋友的名字都写出来。呵！我告诉他，我的朋友很多，有小学与中学的同学，我现在在市役所上班，也有市役所的同事，究竟要我写哪些人呢？他说中学的同学就好了。我知道他要问什么，所以头一个就写李苍降。接着，他就我与李苍降交往的情况问东问西，问一段后，就叫我稍停。我想他应该是去与李苍降对质，查证我所说的是否符合事实。接近中午时，他们终于准许我的请求，让我去上厕所。结果，经过一个房间时，我看见里头关满了台湾学生，其中就有我二中的同班同学雷灿南。一直到下午六点多，他们才放我回家。回到家，听母亲说，我才知道，就在我被约谈的同时，他们也去我家搜查。我母亲知道我被抓去约谈后，就从下午三点多开始，站在门口，等我回家。

刘英昌：我们在宪兵队关了四十天后，除了陈炳基，那些中学生都被陆续释放出去了。我们几个“主犯”就被移送台北监狱。台北监狱就在总督府正对面，一栋一栋放射状，从外头可看到里头，在里面却只能看天；押房的门上覆有铁板，挖个洞，是监视孔。我们一人一房。我在二房。据说，一至四房是重刑犯，许多人被叫出去后就没再回来。因此，我也有相当的觉悟了。

按规定，在押房里头要端正坐

好，不可以走来走去；一个星期有两天可出来运动并洗两次澡。洗澡时，在押房就要先脱光衣服，然后戴着只露两个眼睛的鸭嘴帽出来，下池不到一分钟就要起来。至于不准露脸，它的用意主要是不让我们知道有哪些人也关在里头。

可我很快就知道：郭琇琮在六房，唐志堂廿二房，雷灿南廿七房（起先装疯，后来真疯，唱日本国歌），陈炳基廿九房，李苍降三十房。至于吃，未决犯吃的是六等饭（碗盖写个6），约二两重的糙米（这是我们的营养来源）；已决犯则吃一等饭。菜是带泥煮的山芋头的茎，汤喝完，底下是一层泥；有点盐，却不够咸，很淡。因为营养不够，时间长了，牙齿都掉了，牙齿也坏了。起诉前，检察官又再一次审问我们。审讯后，陈炳基也出去了。

陈炳基：我们的案件被称为“谢娥反日事件”。在案情已经基本清楚的情况下，日本宪兵仍然每天对我们进行抽打、吊打、灌水、不让睡觉等刑求，近半个多月之后，才把我们转交给台北刑务所关押。我在台北刑务所又被关押了一个多月之后，七月底的某天，数名警察突然给郭宗清、黄雨生和我三人戴上镣铐，并且蒙上犯人戴的草帽，推上卡车，押送到检察院。我们看到各自的家长和学校的班主任已经被叫到那里等待。

检察官先把我们训斥了一番，又交代校方和家长要好好管教我们，之后就宣布我们以“起诉犹疑”（暂缓起诉）的名义，由校方和家长担保释放。这时，我们才知道被“谢娥反日事件”牵连的还有唐志堂的同学许钦煊、刘英昌的同学傅赖会和谢叔益；他们也因涉案较少而于同一天被释放了。谢娥、唐志堂和刘英昌三人虽然未被起诉，却一直被告押到抗战胜利。

刘英昌：日本投降前夕是我们最凄惨的一段时期。当台籍看守偷

偷告诉我们德国投降（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的讯息时，我们知道，这样，日本也快快了。我们怕被毒死，不敢随便吃狱中的饭菜；身体就衰弱得不能行动。我的思想也变得悲观、保守，只想出狱后做一个安分无追求的农民。不久之后，盟军轰炸台北城；以总督府为中心，大约每十米落下一颗两百五十公斤的炸弹；台北监狱也被炸了。狱方没让我们疏散到防空洞，只叫我们用毛毯把身体包起来，躲到墙角。结果，关我们的那栋（二舍）几乎被炸平了。我和郭琇琮的二房和六房较近中心，情况还好；可天花板掉落，门也炸坏了。我用脚一踢就出来了。我后来听说，蔡志恕当场被炸死了。

李薰山：李苍降和雷灿南被捕后始终咬紧牙关，忍受日本宪兵惨无人道的拷打，没有把我供出来而保护了我。后来，雷灿南终于被判刑求至死，并于同年六月廿五日瘐死狱中。李苍降则处刑五年，一直要到台湾光复后，才释放出来。

一九四六年三月廿四日下午，陈逸松等人在淡水举行雷灿南追悼会。郭琇琮以当时还很少人会讲的国语主持，文学家张文环也特地从中部赶来致敬。最后，由李苍降恭读王昶雄写于三月一日，题为《追悼革命先烈雷灿南先生》的悼文，其中提到，雷灿南：“虽置身日本高压之下，心系社稷，不忍坐视祖国之危急。乃舍身家于不顾，潜心革命，计划组织台湾青年，集结青年力量，呼应祖国之抗战。”

作者1960年生于中国台湾苗栗，1987年加入陈映真先生创办的《人间》杂志报告文学队伍，长期从事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与写作，出版有《台共党人的悲歌》等相关著作20余部。现任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本文及图片均选自其作品《观马车之歌·续曲》（三联书店2018年3月出版）。转载已获授权，文字略有改动，现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

民国银领 >

一个北平小行员的“沦陷日记”（上）

文 / 潘晓霞

1942年12月11日，刚刚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的董毅，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进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当一名行员。

战乱之中，生存要紧，有了饭碗，自然高兴，但入职日伪政府开设的银行，董毅内心总还是有点难以释怀。上班第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只有暂且应付目前，有什么办法，说实在的，我今日得到确职，在为人为子，生活所迫方面是得到了甚大的慰安”，但“在自己心灵、个人思想品格意志方面，不但毫不开心，反而受了污点创伤，是无可奈何的悲哀，是我最痛心的事”。

然而外寇入侵，山河破碎，像他这样在沦陷区蛰伏求生的普通中国人，又岂在少数呢？

聘用董毅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下简称“联银”），成立于1938年2月，由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筹办，相当于该伪政府的“央行”，

总裁叫汪时璟，是有名的大汉奸。

汪早年留日，从伪“联银”成立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一直担任该行的总裁，自1938年10月起，还兼任伪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及财政总长。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汪时璟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伪“财务总署”督办，可以说始终掌握华北地区伪政权的财权。

董毅的出身本来不错，民国初年时董家也算仕宦人家，生活殷实，但军阀混战、社会混乱，好好一个大家庭逐渐衰落破败。“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占领北平后，董家的日子雪上加霜。董毅幼承家教，一向瞧不起银行这份职业，他的人生理想是，要么当个文人雅士，或到大学教书，至少也要进政府为官。这样一个本来朝气蓬勃、满怀梦想的大学生，在日伪统治下委曲求全，精神上的苦闷可想而知。

初人“联银”的董毅，被安置在计算局，那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职位。他在日记中用流水账记录了每日的无聊：

“银行生活是那么机械刻板，到了签到盖章，领下今日应做的一份，开始写联行往来日记账，写完分开传票与报单，再计数全对了，这就完了，初入行都经过此一步的训练基本工作。”

“整日又是给人家写账，初入行都得给他干两三个月这事呢，机械干燥极无味的生活，长此下去，何日方是出头之日？不是为了一家生计所迫，岂肯失节至此？”

工作上一日复一日的单调琐碎，虽让他心中生怨，但也有聊可安慰的事：

“午饭在银行附设的饭厅吃，每月扣去二十元饭费，吃大米、白面馒头，十人一桌，六菜一汤。看起来伙食标准还是不错的。”

可刚上了一个星期班，他发现伙食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好了。1942年12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

“今日中午开始吃二米饭，用小

米及大米合蒸的，本来是规定用大量白米，少数小米，结果蒸出来正相反，大家便尽量先吃馒头，吃得没有了，才吃饭，一桌上本应有一斤肉，结果有四两就不错，办伙食这位先生可吃足了，闻配给面粉亦将没有，联行好的时候全未赶上，未受到利益，却还蒙一个进联行的名，倒霉！”

1942年以后，北平的缺粮窘境日甚一日，到1943年夏几乎陷入谷底。这固然与年景不佳有关，更多还是因为日寇不断以战养战，沦陷区的有限口粮及各种生活物资，仍要抽调出来无休止地供应前线。

其实早自1940年起，沦陷区的社会情势已每况愈下。借通货膨胀转嫁战争投入已是日伪惯用伎俩，市面物资短奇缺，物价急剧上涨，百姓生活更趋局促。1940年2月21日董毅的日记（当时他仍在上大学）记道：

“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四分一块。……大米一百廿八

元一石，次米三毛七八一斤，还没处买；面一元八一斤。其余无不奇，即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也！言来不胜浩叹，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齿齿发愁不已。”（“米”合三毛六分一斤，从前亦只一毛余，三元一袋之白面，今涨至七倍。真为前所未有之现象也。”

从银行第一次领到薪水的董毅，心情还是不错的。1942年12月25日，“今日上午发下本月薪水津贴及饭费，才去了十四天，从人行日起到本月底止，共计九十六元六角正”。到了第二年初的1月4日，“我方人行三周，前后已拿回百四十元了，不算少”。

董毅领到的薪水，在当时的北平，能有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呢？1943年1月10日他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小米面已售到一元二二一斤，小米一元二一斤，杂合面还没有；米零售数斤，一元六七一斤，多无有，整石亦有，非有人方能买到，且暗盘到三百元左右一石；面是配给才能吃到，平常早已买不到了。……连日杂

粮食尽，我拿回了钱，全买了食粮还不够，昨晚与铸兄处借来十元，今日随便一用未买什么，已是没有了，真没办法。”

“今日开始午饭本来的六菜一汤改为三菜一汤，盘数减少，量数并未减少多少，且质亦较好，还加了两盘糕饼，在家在外全吃糕饼了，真糟心。”“各物每日飞涨，煤球已涨这一元三四一百斤，有到一元六七的可能，小米及小米面是一元多一斤，玉米渣已一元二，什么日子，就挣这么点，怎么够吃的。”

董毅的感慨，并非无病呻吟。1942年底，北平市场上玉米面价格暴涨到每斤1.05元，是1939年时的11倍。董毅月薪140元，而当时在伪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作的一个技术员，经过加薪后的月收入不过120元。这类“白领”“银领”，在战前的北平应该算是中产了，但此刻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未完待续）

作者为学术期刊副编审，历史学博士，专治民国金融史，著有《1908—1937年的交通银行》。